



史学文丛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

Mingdai Gechen Qunti Yanjiu

洪早清 著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D691
20137



史学文丛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

Mingdai Gechen Qunti Yanjiu

洪早清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洪早清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6

(华大博雅·史学文丛)

ISBN 978-7-5622-5537-6

I. ①明… II. ①洪… III. ①政治家—群体—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766 号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

◎洪早清 著

责任编辑:张建英

责任校对:王胜

封面设计:甘英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u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82 千字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0.25

版次: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27.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善破，舞姿夭夭，才气纵横，不虚得，室满翰墨，课堂常留良，薪水微蒙
梦玉成。其性率真文质兼备，而字飞流百尺，笔走千岩，深具骨力，学富
武经，通晓古今，业精本草，已命世本个，工长生武学，兼有「文采风流」
之才，中其道承，树大避王，大德立斯天，本厚则厚，德生大朝，育树个以，有一
味真书，感神聊求不老翁”，李君吾昔曾示予章，称大学史学系主任
立此特稿，对史家学史，辞品兼得，立此特稿，以资史料，史学史”，人称自
牛皮的教科书，作此由来已久，文如其人，学如其名，人称学的
魏延，魏延长于于羽扇，享共祖类人全式以身自而，宜良的卦文思另具
史学乃我校的传统优势学科，百年来可谓大师辈出，新秀迭现，
形成了良好的史学传统，每一时代，都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问世，体现了桂子山上学脉的薪火相传。

校出版社有鉴于此，遂决定在“华大博雅”书系的品牌之下，专列一“史学文丛”，成龙配套地陆续推出多部史学专著，以彰显华师源远流长的史学精神。有感于出版社诸君的苦心孤诣，借此丛书推出之机，采撷此间堪称大师级的三位前辈学人的珠玑之言，以管窥其所倡导的治学精神与风格，为后来者树一标尺，亦聊塞作序之责。

文史大师钱基博尝言：“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涘，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文如其人，学如其名，钱老学术生涯的精髓，便在于淹贯浩博、系统条贯，具有极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恢宏的学术气度，“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至形成通识”（章开沅先生语）。厚积方能薄发，根深才能叶茂。钱老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人的典范，鼓励后人务必要有远大的学术眼光和追求，由博古通今而终成一家之言。

文献学大师张舜徽曾谓：“余之一生，自强不息。若驽马之耐劳，
如贞松之后凋，黾勉从事，不敢暇逸……惟视读书为性命，修其身寄其情于卷帙。于世俗荣枯亨困，未数数然也。”舜徽先生昭示于我们的是
那种数十载含辛茹苦、自强不息、孜孜治学的心声和持之以恒的学术
敬业精神。正是以这种超然而高远的学术追求为强大动力，舜徽先生
方能以小学的学历自学成才，成就为著作等身的文献学大师。“文革”

受难之际，身居澡堂改就的陋室，仍能不分酷暑严冬，心无旁骛，刻苦治学，日积月累，终于写成两百多万字的巨著《说文解字约注》，光毛笔就写秃了50多支！在舜徽先生身上，个体生命与学术事业已俨然融为一体，以个体有限之生命延续学术无限之薪火，无怨无悔，乐在其中。

近现代史学大师章开沅曾寄语后学：“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在章开沅师看来，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治史固然也需要灵气，但更需要真诚和勇气，“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治学不为媚时语”，就我个人的肤浅理解，一是在做人上，要有独立的人格，襟怀坦荡，一身正气，不媚时趋俗，不急功近利，一心以求学术的“真经”；二是在治学上，则应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追求，以最终形成独立的学术风格，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个性。惟其如此，方能成为那种既能“铁肩担道义”，又能“妙手著文章”的“真正的史学家”。

从钱老的“淹贯浩博”到舜徽先生的“持之以恒”，再到章开沅师的“浩然之气”，我们所撷取的不过是这些史学大师的片言只语，所反映的也只是他们学术生涯的一个侧面，但这些珠玑之言，已多少展现了桂子山上所延续的学术精神与学术传统，像盏盏不灭的明灯，永远照亮我们的学术之路。

唯愿“史学文丛”所收录的学术著作，能秉承前辈学人的优良学术传统，光而大之，不苟且，用真心，求“真经”，永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和后人的评说。是为序。

马 敏

2007年1月13日于桂子山澹泊斋

序 言

《安徽史学》杂志的“史学、史家与时代”栏目曾向我约稿，希望能够就自己的治学心得写点具有时代意义的话题，以“唤醒一种执著而高尚的学术精神，倡导一种严谨而自由的学术风格，鼓励一种务实而平允的治学态度”（主编按语）。近日，利用假日的时间，我将长期治学和教学中思考的史学素养问题撷取了一个侧面，写就了一篇小文《史学研究需要前沿意识》，文章认为：“史学前沿”即指史学研究中代表史学发展趋势，引领史学发展方向，汇集史学研究的新范式、新方法、新观点、新视角等的学术领域，是史学发展不可或缺的学术力量；而“史学前沿意识”，则主要指具备史学前沿的学术理念和学术素养，并自觉地以此去审视、评判以及从事史学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史学界的前沿意识不断增强，尤其是社会史、新文化史等的崛起使得史学前后的学术意义日益突出，然而，忽视前沿、缺乏前沿意识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

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前沿意识的贯彻是必需的。近年来，国内外中国史研究推出了一批前沿性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些成果在问题意识、对话意识、多学科交叉研究、研究范式的建构等方面都极为出色且启人心智。史学前通常具有开拓意义，从理论到方法，从视角到视域，从学科交叉到观点推新，不断的创新总在史学前反复演绎。与传统史学比较而言，新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在学人们的孜孜探求和不断实践中，许多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被开发出来，与此同时，不少旧有的课题也被赋予新的视野而展开新的研究。以台湾新史学为例，生态环境史、人群生命史、宗教史、女性史、通俗文化与日常生活

活、社会文化史、城市史等均得到全面的研究，其中，生态环境史、身体史、新文化史等当为新拓展的研究领域，而在一些固有的领域中，新课题仍是层出不穷。显然，台湾新史学的研究深受国际史学（尤其是国际汉学）研究的影响，而台湾新史学的研究对大陆有着直接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史、环境史、医疗史、慈善与社会保障、灾患与社会救助等研究领域中的学术成就，反映出国内的学术前沿在整个国际学术环境的影响下，日趋活跃并不断开拓的可喜气象。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政治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一些传统政治史的课题在新的视角中，被赋予了新的诠释和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展开在案头的这部书稿《明代阁臣群体研究》便是，作者洪早清博士对传统课题以新的视角进行考察，他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之上，经过多年的修改、补充与提升、完善，即将付梓出版一部佳作。

洪早清博士有着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大学毕业留校之后，虽一直在从事行政工作，然而，学术研究却是他难释的情怀和矢志不渝的追求，静处于安宁的环境中窥探历史、潜心治学，成为他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工作之余，书店成为他最爱流连的场所，购买学术著作成为他最大的乐趣。2003年，洪早清开始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明清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我与他相交多年，自他入读博士学位之后，我们在师友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术研讨和观点交流的氛围。客厅、书房、茶馆、办公室，我们多次、反复地讨论问题，交换观点，有时直至子夜。交流越多，探索愈深，兴趣益浓。攻读博士期间，洪早清投入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和较多的时间、精力，当然经济上的投入也不少，读博4年，他购置了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其中不少是十分精贵的原始文献材料。阅读、思考、写作，为了使得研究更深入、更成熟，写出更满意的学位论文，他主动请求延期一年答辩。我已经培养了十多届博士研究生，客观地说，如他这般执著者还不多见，其治学精神可嘉可叹。

洪早清的博士学位论文《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就选题而言，既陈且新。所谓“陈”，主要是指明代阁臣问题属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老

话题,学者们就此发表的成果可谓不计其数;所谓“新”,则意指视角的新颖,学术界尚无整体考察明代阁臣群体者。新的视角带来了一系列颇具学术意义的创新。

迄今为止,针对明代阁臣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题性著作主要有二:一为王其策的《明代内阁制度史》(中华书局 1989 年版),二为谭天星的《明代内阁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王著主要从制度史的角度,论述和梳理明代内阁制度演变史,谭著则侧重于政治史的考察,探讨明代内阁政治的演进。其中,王著的“明代阁臣简表”和“明代阁臣简传”,谭著对明代阁臣群体地理区域分布、出身、任期的详细说明,以及根据政绩、为人及权力水平表现等对阁臣的基本分类,皆颇具学术价值。

除了以上二本专著,其他有关明代政治制度史的著述中也都从不同的侧面或多或少地论及明代内阁问题,此外,还有一批对于明中后期内閣首辅进行专题性研究的论著。已有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虽是显而易见的,但对于明代阁臣的整体性考察甚为欠缺,对于阁臣群体与明代政治、明代社会乃至整个明代历史关联的研究也有待加强。这种状况恰为明代阁臣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拓展空间和深入余地,这也正是洪早清博士坚定地研究明代阁臣群体的主要原因及其主要的学术着眼点。洪早清在“绪论”中有如是表述:“对阁臣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一些,但仅限于对阁臣个体的研究,论点比较分散,难窥阁臣群体的全貌。从群体角度进行全面研究的则很少,个人认为:阁臣群体是明代比较特殊的中央高级官僚群体,应该把这个群体放在明代的大历史中来作多侧面、多方位的考察,把阁臣的运动和明代历史的运动搁在一块来讨论,透过这个群体活动的跌宕起伏,来把握明代历史的真实演变,让 276 年的明代历史由抽象和格式化变得充分互联和生动起来。”

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种历练,对于洪早清而言,这种历练较诸常人更为难得。我清楚地记得,在学位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他曾深切地感叹道:为学与从政真的相通啊。多年的为政经历使他不仅在文字中走近了明代阁臣群体,更从精神上与他们渐行渐近,而对明代阁臣群

体的系统、深入研究，又使得他对为政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其实，大凡学术研究都是可以与人生理解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对极具现实意义的课题的研究，一定是对我们心智乃至人生的磨砺。

阅读几经修改、完善之后的《明代阁臣群体研究》，深感其中凝结着作者的心血，然而令我不断心动的是文中所持续闪现的新意和灼见。我不欲一一地列举这部书稿的优点，仅举数端，以聊心慰。更多的内容留待同仁们去品读、斟酌、对话。

其一，视角新颖，立意甚高。从《明代内阁制度史》到《明代内阁政治》再到《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大体反映了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这一个时期学术界对于内阁问题考察的学术发展脉络——视角不断拓展，研究不断深入。对于明代阁臣进行群体性的研究，实质上是对制度史、政治史研究的重大转型，赋予传统课题以新的学术意义。从群体的视角研究内阁与阁臣，必将赋予研究对象以更丰富的政治、社会、历史内涵。作者的学术立意甚高，正如其“结语”部分所言：“阁臣群体应该是认识明史的新视角，通过对阁臣群体的深入研究必然有助于我们更加充分理解明代的历史。”

其二，视野广阔，关照全局。《明代阁臣群体研究》的学术视野甚为开阔，全文在系统论述明代阁臣群体的历史特征、政治作为、人格特性及权力运作格局等问题的同时，将阁臣群体作为认识有明一代历史的新视角，群体成为反映历史演变的重要侧面。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还可见文中对于阁臣群体与明代政治格局的关联，阁臣群体与明代国运的关系，阁臣群体与明代皇帝、宦官、部院长官等政治群体的关系的全面关照，笔触细腻，思路纵横捭阖。通过作者笔下的阁臣群体，我们不仅对明代政治格局的演进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而且对明代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其三，对话意识浓烈。当代史学的价值评价出现了许多积极而重大的变化，诸如问题意识、对话意识、多学科交叉研究等都成为我们评价优秀学术成果的要素。许多好的学术成果并非仅只为了完成一个课题或推出一项成果，而且力图与已有的相关研究展开讨论，构成对话的态势，推动该问题或该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客观而言，

《明代阁臣群体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对话意识均较突出,但对话意识更令人印象深刻。文中代表性内容甚多,此不一一赘言,仅以“结语”为例。在这个部分,作者讨论了“如何认识明代阁臣群体的历史地位”,认为“历史中的明代阁臣群体并未获得史家真正客观的评价,由于历史记载的选择性和有限性,不少人习惯于从内阁的性质、阁臣个人的政治遭际及阁臣之间的争斗等方面来观照整个阁臣群体,甚至脱离明代政治实际假阁臣以宰相职任而论之”。基于这种认识,作者针对自古至今的主流观点,一一展开讨论与对话,在明确自己观点的同时,还提出考察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

其四,新见迭出不穷。从选题视角到问题解读到材料运用,《明代阁臣群体研究》在每一个重要环节都充分体现了其良好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仅以新见而言,文中频现新观点、新见解,诸如“明代阁臣群体辅政方式间接多于直接、调理多于执行,其所发挥的作用具有相当的潜隐性,其辅政效果对朝政的平稳运行更加具有润物无声之意义”,“突出地说,在明代历史发展的几个重大关键时刻,都是以阁臣群体为核心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才使得明朝一次又一次度过倾危之险境”,“明代阁臣群体人数众多,不同阁臣的政治素质和权力意识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对于皇权的依附性和制约性表现大不一样,加之皇权出于自身专制的需要对内阁时重时轻,阁臣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大小必然具有阶段性特征,故指望阁臣群体自始至终都能有效地发挥其政治作用显然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允许”,“要全面理解明代阁权与皇权的极其不平衡性对内阁所造成的影响,内阁的性质及阁臣权责始终不明的特点决定了阁臣参与平章军国重事更多的是采取间接的渐进的方式进行,过于直接或激进的方式不仅会容易恶化阁臣与皇帝的关系,导致皇权对阁权的严重疏远,同时也很容易招致外廷的借口攻击,使阁臣难于集中精力辅政。所以,单纯以前代宰相的行事方式来衡量阁臣的辅政过程及效果是完全脱离当时的”。以上数端足以体现论文在观点上的新意及其认识的深刻。

当然,该著并非毫无瑕疵,总体而言,宏观把握有余,微观解读尚

有不足。同时，学术的探究永无止境，关于明代的阁臣群体，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作者在著作中已自言及，并表示这些问题都将是自己今后潜心研究的课题。果真如此，明代内阁研究必将又见新高。

我们期待洪早清更多的学术灼见。

吴琦 谨识于南湖之畔
2012年立春之际

目 录

绪论	(1)
一、明代内阁制述要	(1)
二、相关研究动态	(12)
(一)关于内阁制度的研究	(12)
(二)关于阁臣群体与个案的研究	(13)
三、研究的基本思路	(24)
第一章 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及主要特征	(27)
一、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	(29)
二、明代阁臣群体构成的主要特征	(29)
(一)阁臣入阁与在阁资格特征	(30)
(二)阁臣群体籍贯的分布特征	(34)
(三)阁臣入阁前的仕宦履历与入阁年龄的结构特征	(36)
(四)阁臣群体履任阁职的时间特征	(38)
(五)阁臣群体的机缘关系特征	(40)
第二章 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上)	(47)
一、平庶政	(48)
(一)永乐迄仁宣	(50)
(二)从正统到正德	(54)
(三)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	(68)
(四)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末	(76)
二、代王言	(80)
(一)草拟诏旨	(82)

(二)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	(87)
第三章 阁臣群体的政治作为(下)	(96)
三、挽时艰	(96)
(一)新旧交替之际	(96)
(二)皇帝幼弱之时	(99)
四、陈规谏	(103)
(一)规谏皇帝失礼	(103)
(二)规谏皇帝失德	(114)
(三)规谏皇帝失政	(118)
第四章 阁臣群体的人格特性	(123)
一、为相情结	(125)
二、绝对的皇权依附心理	(143)
三、非道德性的人格操守	(156)
(一)相互排陷	(156)
(二)结好中官	(163)
(三)嫉忌才能	(167)
(四)贪利营私	(169)
第五章 阁臣群体的政治权力运作格局	(179)
一、永乐至正德：以谋国为主旋律	(180)
二、嘉靖、隆庆时期：谋权与谋国的交响	(186)
三、张居正时代及其后：从鼓乐齐鸣到曲绵声噎	(191)
结语：明代阁臣群体的历史地位	(200)
附表：明代阁臣群体一般情况简表	(211)
参考文献	(294)
后记	(313)

绪 论

一、明代内阁制述要

公元 1368 年正月，朱元璋在南京正式建立明朝。明朝建立之初，其官僚机构设置基本上采用元朝的一套制度，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掌行政、军事、监察，朱元璋对中央三大机构的职能分工作了如此说明：“国家新立，惟三大府总天下之政，中书政之本，都督府掌军旅，御史台纠察百司。朝廷纪纲，尽系于此。”^①但从实际上考察，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的地位是低于中书省的，而且其长官是不常设的，中书省总理天下庶政，是三大府中权力最重的机构。中书省设左右丞相，领导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有事必先关报中书省，然后由中书省奏闻皇帝。这一制度规定了六部是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凡是六部和地方的各种奏报，都要先关白中书省；而一切以皇帝的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要经过中书省下达。这样一个威权至重的机构及其总理之丞相的存在，无疑是和皇权专制相矛盾的，因为国家行政的大部分实权掌握在丞相手中，皇帝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且容易形成丞相专权。起自寒微、马上杀出天下的朱元璋对前代累朝的教训应该是进行认真思索过的，所以，在强调中书省重要性的同时，他又指

① 杨士奇等. 明太祖实录[M]. 卷 21“吴元年十月壬子”条.

出：“人君不能躬揽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①，并认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政专中书”，“凡事必先关报，然后奏闻。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导致大乱，深可为戒”^②。因而在立国不久，朱元璋便通过分散地方权力、控制其工作、裁削其人员、从组织上架空等措施对中书省加以严密防范^③。

尽管如此，朱元璋还是不能容忍在他与中央各部门及地方之间有一个中书省的存在，特别是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勋大臣李善长任左丞相时，形成了淮西势力集团，并援引亲戚加同乡的胡惟庸为相，直致胡惟庸独相数年中，“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奏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④。更加促使朱元璋下定了从体制上消除对皇权专制起着制约与妨碍作用的制度的决心。洪武十三年正月，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杀掉了胡惟庸，随即“罢中书省，废丞相等官，更定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⑤，部权和军权全部直属皇帝，原属于丞相的事权收归于皇帝，皇帝在综理天下机务方面代替了原来中书省丞相的角色。为防止后世子孙复置相权，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明令：“朕罢丞相，设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权归于朝廷。嗣君不许复立丞相。臣下敢以请者置重典。”^⑥除此之外，还特别敕谕群臣：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

^① 杨士奇等. 明太祖实录[M]. 卷 59“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条.

^② 杨士奇等. 明太祖实录[M]. 卷 117“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条.

^③ 白钢等.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九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72.
南炳文，汤纲. 明史(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7-78.

^④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308“胡惟庸传”.

^⑤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2“太祖本纪二”.

^⑥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3“太祖本纪三”.

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①

丞相制度的废除，实现了朱元璋独揽中央大权的愿望。但接着而来的问题是，政皆独断、事必躬亲的朱元璋，无论如何勤政，也招架不住日以千计的各项具体政事，他不得不承认“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②，“既又念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乃建四辅官”^③。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设立了四辅官来帮助他“佐理”政务。四辅官以春夏秋冬命名，“以王本、杜佑、龚敷为春官，杜敷、赵民望、吴源为夏官，兼太子宾客。秋、冬官缺，以本等摄之。一月内分司上中下三旬。位列公、侯、都督之次”^④。四辅官到底干什么，朱元璋并没有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他在《谕王本等职四辅官》中说：“朕政未施，访近臣而求士，召尔王本等来朝，命为四辅之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必欲均调四时，德合人天，卿等慎之，国安盛世。”^⑤不久，又敕王本等：“……古者三公四辅，论道经邦，理阴阳，顺四时，乖戾则曰失职，卿等尚竭忠勤，用佐厥终。”^⑥表面看来，朱元璋对四辅官是非常礼遇的，《明史·安然传》云：“位都督次，屡赐敕谕，隆以坐论之礼，命协赞政事，均调四时”，“刑官议狱，四辅及谏院复核奏行，有疑谳，四辅官封驳”，但从实际上看，朱元璋所说的“论道经邦”不过是一种说辞而已，四辅官依时任职，轮流供事，不仅在职权上无法与丞相相比，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没有政治经验的年高老儒，皆“纯朴无它长”^⑦，基本上起不了辅政的作用。不到两年时间，朱元璋便取消了四辅官的设置。

① 杨士奇等. 明太祖实录[M]. 卷 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条.

② 杨士奇等. 明太祖实录[M]. 卷 133“洪武十三年九月戊申”条.

③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137“安然传”.

④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72“职官一”.

⑤ 朱元璋. 高皇帝御制文集[M]. 卷 7“敕二”. 嘉靖十四年(1536 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⑥ 谈迁. 国榷[M]. 卷 7“太祖洪武十三年十月戊午”条.

⑦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137“安然传”.

朱元璋一方面不允许再置丞相，另一方面又少不得辅政之人，四辅官之设已然告败，只好另寻新办法。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他仿照宋朝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士，并任命礼部尚书邵质为华盖殿大学士、翰林学士宋讷为文渊阁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旋即又征召耆儒鲍恂等为文华殿大学士。这些人都是以文字翰墨见长的文学侍从之臣，其主要任务是协助文墨工作，无预政事。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命吏部拟定翰林院的官制，并定翰林院学士秩为正五品。其后，又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和文渊阁、东阁三殿二阁的大学士俱为正五品官秩（终明之世，殿阁大学士官秩五品之制没有改变）。总的来说，朱元璋在位时期，大学士基本上是由文学之士担任，侍皇帝左右，仅是备顾问而已，根本缘于“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①。尽管如此，研究者认为：洪武时期的大学士虽无参决政事的可能，但它作为一种辅政方式却为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形制上的基础，它为后来内阁的产生开了先河，是后来内阁制的萌芽和雏形^②。

内阁真正建制则始于明成祖朱棣。建文四年六月，燕王朱棣以武力从其侄儿手中夺取帝位，“八月壬子，侍读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③。七人朝夕在皇帝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④。黄佐在《翰林记》卷二“内阁亲擢”中对朱棣如何发挥解缙等

^①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72“职官一”.

^② 参见谭天星《明代内阁政治》第 9 页、第 10 页；方志远《明代内阁制度的形成》，载《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第 24 页；南炳文、汤纲《明史》(上)第 140 页；张晋藩主编《中国官制通史》第 501 页。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明代内阁辅政制度的开端”(见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上册第 250 页)。

^③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5“成祖一”. 《明史》卷 147“解缙传”云：“成祖入京师，擢侍读，命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内阁之预机务自此始。”又据《明会典》卷 29“职官一”载：“成祖即位，特简解缙、黄淮入直文渊阁，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同入直，预机务，谓之内阁。内阁之名及参预机务自此始。”

^④ 张廷玉等. 明史[M]. 卷 147“黄淮传”.